

关于评价成吉思汗的几个问题

成吉思汗的活动，不仅关系到蒙古族的历史，而且关系到整个中国以至世界的历史。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在评价这个历史人物时从来是意见分歧、毁誉不一的。6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曾开展过关于成吉思汗的讨论，通过讨论，弄清了不少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历史事实的分析，对评价成吉思汗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成吉思汗是中国古代蒙古政权的汗

蒙古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蒙古族的祖先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劳动、生息和繁殖的。成吉思汗是蒙古的汗，因而也是中国古代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汗。不能把历史的蒙古当作是外国。要知道，今天的蒙古族大部分仍然居住在中国境内。

蒙古族的祖先是中國境内东胡语系室韦的一支，《旧唐书》称其为“蒙兀室韦”，《旧唐书·室韦传》、13世纪蒙古人自己的著作《蒙古秘史》（即旧译《元朝秘史》）、伊利汗国历史学家拉施特丁的《史集》等史书，说蒙古人的祖先最早居住在额尔古纳河流域，大约在公元七、八世纪时开始西迁，他们渡过呼伦泊，来到鄂嫩河和大肯特山驻牧。从此，他们与居住在漠北高原上的突厥、回纥各部杂处。不论是额尔古纳河还是漠北高原，当时都是唐朝政府管辖的范围。东突厥覆亡后，唐太宗又击败了薛延

陀，漠北各部先后归附唐朝。贞观 20 年（647 年），唐朝特设燕然都护府（后改为瀚海都护府和安北都护府），以管理整个大漠南北，蒙古各部亦在其管辖范围之内。蒙古各部之一的塔塔儿六部中，有一个叫“都督之部”^①，可能就是唐朝任命某室韦都督世袭统治的一部。唐末，阴山鞑靼（蒙古各部之一汪古部的祖先）曾随沙陀首领李克用进入中原镇压农民起义。以后蒙古各部又多次向五代统治者纳贡。

10 世纪初，契丹辽政权建立后，漠北各部都臣服于契丹，蒙古各部亦在其中。辽朝政府在阴山以北置西北路招讨司，管理蒙古和其他部落。蒙古各部向辽政府进贡方物，辽政府则封蒙古各部的首领为“详稳”、“令稳”等官职。

12 世纪初，金朝代辽。蒙古高原属金西北、西南、东北三路招讨使统辖。所以黄震《古今纪要》逸编说：鞑靼“皆事女真”。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说：“方金人盛时，岁时人贡，金人置东北招讨使以统隶之。……〔黑鞑靼〕皆臣属于金，每岁其王自至金界贡场，亲行进奉，金人亦重行答赐，不使入其境也。”黑鞑靼即蒙古部。金朝任命的蒙古各部首领也称令稳、详稳、节度使等。成吉思汗本人和其他蒙古首领都接受过金朝的封职。直到 1210 年成吉思汗才正式与金破裂，中断关系。《元史·太祖纪》载，金主璟死，成吉思汗问金使，新君为谁？金使说是卫王允济，“帝遽南面唾曰：‘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何以拜为！’……遂与金绝”。

由此可见，在 1210 年前，蒙古是我国历代中原王朝的属部，蒙古各部的活动地域，是历代中原王朝的辖地。因此，成吉思汗作为蒙古政权的汗，也就是当时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汗。成吉思汗与金朝关系破裂固然有反压迫的一面，同时，也有争当中原皇帝的一面。读一读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的《建国号诏》是很有意思的。他把成吉思汗的事业和他建立的元朝，看作是尧舜禹汤、秦汉隋唐的继承，所以要“绍百王而纪统”，并称成吉思汗是元朝的“太祖圣武皇帝”^②。成吉思汗时虽还没有建立元

朝，但元朝总是和成吉思汗联系在一起的，这不是很说明问题吗？

这里，有必要对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一文中关于成吉思汗的一段话作些分析。鲁迅说：他在 20 岁的时候，“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 25 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鲁迅这段话写于 1934 年。它并不是对学术研究作什么结论，而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派一贯采取媚日反苏的政策所写的。鲁迅把 1931 年 9 月日本占领东三省称为“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典”。“我们的权力者（指国民党），现在已经明白了古之斡罗斯，即今之苏联，他们的主义，是决不能增加自己的权力，财富和姨太太的了。”当时以“民族主义文学家”面目出现的国民党御用文人，为了迎合国民党的媚日反苏政策，乘机发表“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成吉思汗向外扩张，给中国人民和斡罗思、匈奥各国都带来了灾难，并不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中国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实是不能算中国民族的光荣的”。③鲁迅的这些言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媚日反苏都是有力的抨击。但是如果把历史上的蒙古与中国并立起来，说蒙古征服中国，中国人做了“奴才”，那是不十分恰当的。鲁迅是杰出的文学家，他只是“随便翻翻”三部蒙古史，未必有时间去搜集我们前面引的那些史料，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不能实用主义地把鲁迅这段话拿来作为成吉思汗的活动与中国历史无关的论据的。

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民族英雄 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有贡献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和反抗女真贵族压迫，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业绩。

12 世纪末，蒙古高原上有近百个大小不一、语言文化各有差异的部落，其中大部分正处于奴隶制发展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蒙古社会迫切需要实现统一。但是，各部奴隶主贵族间互相夺掠和仇杀，人民生活极度不安。“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④

女真统治者为了达到长期蹂躏和掠夺蒙古各部的目的。用挑拨离间的办法使蒙古各部互相残杀，以防止他们统一和壮大起来。金时，“山东、河北谁家不买鞑人为小奴婢，皆诸军掠来者。……鞑人逃遁沙漠，怨入骨髓。”^⑤女真统治者的这种罪恶行为，激起了蒙古各部人民的极大义愤。因此，不解除女真贵族的民族压迫，蒙古各部要统一、要结成一个共同体，蒙古社会要发展，完全是不可能的。

立了蒙古政权；随后，他又摆脱了对金朝的臣属关系，解除了女真的民族压迫。成吉思汗的这些活动是符合蒙古民族利益的，因而也受到了蒙古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因为蒙古各部的统一，打破了各部落之间长期的割据状态，形成了地域的共同性，促进了各部之间经济和文化联系和共同语言的使用，为蒙古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伟大的蒙古族从此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所以，成吉思汗作为蒙古族的民族英雄是当之无愧的。

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统一了全中国，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当 13 世纪初蒙古崛起于漠北高原时，中国正处于政权并立、分裂割据的状况下，如果从唐中期安史之乱算起，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四、五个世纪，因此严重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成吉思汗则用其武力，迫降了畏兀，灭亡了西辽，臣服了西

夏，击败了金朝，在 1227 年他去世前，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统一在蒙古政权之下；他的继承者最后灭了金、宋，统一吐蕃、大理，结束了全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元朝的大统一是空前的，其版图“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⑥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统一事业既然为汉唐所不及，因此，这种统一在客观上起到进一步巩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作用。周恩来同志说过：“祖国的统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⑦当然，历史上的统一事业不是无产阶级来完成的，因而也不可能用民族联合的方式来实现；相反，历史上的统一事业只能由剥削阶级通过战争的手段来完成。战争必然有破坏，统一总是包含着民族压迫。不能因为有战争破坏和民族压迫就去否定统一；也不能因为秦皇、汉武、唐宗是汉族，成吉思汗、忽必烈是蒙古族，因而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

在评价成吉思汗时，很值得我们探究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经过元朝百年统治后，60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并没有出现大规模、长时间的分裂割据局面？事实证明，这是因为中国各民族之间民族联系加强了，民族大家庭进一步巩固了。

如前所述，13 世纪以前的蒙古各部一直是唐、辽、金等各中原王朝的属部，但他们与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还不是很紧密的。在蒙古统一全国过程中，特别是元朝建立后，蒙古族与其他各族的联系、其他各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从文化上看，先是塔塔统阿用畏兀儿文字书写了蒙古语，后来是八思巴用藏文创制了八思巴蒙古文，而大批入居内地的蒙古子弟则接受了汉文化，其中不少人成为用汉文从事著作的文学家、艺术家，至于随蒙古军队进入内地的西域人接受汉文化的事例就更多了。从经济上看，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随着大批汉族农民和工匠迁徙和俘虏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发，到过漠北的丘处机、张德辉、刘好礼等都曾目睹了汉人、畏兀儿人和蒙古人在那里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元初刘好礼在叶尼塞河畔任吉利吉思等处断事官时，当地“数部民俗……不解铸作

农器，好礼闻诸朝，乃遣工匠，教为陶冶舟楫，土人便之”。^⑧从政治上看，成吉思汗进入中原后接受封建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不可避免，特别在契丹人耶律楚材等人的帮助下，加速了这一过程。同样，随着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对中原地区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也有很大影响，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互相的渗透，各族人民共同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科学和经济发展水平。列宁说：“只要各个民族居住在一个国家里，它们在经济上、法律上、生活习惯上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⑨元朝时期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是中国最近 600 多年维持统一局面的重要原因。各民族联系的加强，仍然是历史发展的主流。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清代时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成吉思汗西征给各国人民带来了灾难， 但人民是没有责任的

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对亚欧各国的侵略，与蒙古灭畏兀、西辽、西夏、金和南宋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向国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后者是国内民族战争。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在西征过程中，杀戮人民，掠民为奴，毁灭城镇，破坏农田，给中亚、西亚和欧洲不少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造成这些地方的经济和文化的严重破坏。虽然蒙古铁骑冲破了亚欧各国的此疆彼界，促进了东西交通的沟通和文化交流的繁荣，但这毕竟不是成吉思汗西征的历史功绩。

我们并不讳言西征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战争的灾难，但是，无论当时和现在，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是没有责任的。“黄祸论”者利用欧洲人对成吉思汗心理上的恐惧和仇恨，来挑起他们对整个黄色人种的仇恨，这完全是徒劳的。事实上，蒙古人民、中国北方各族人民都是西征的受害者。

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西征完全是奴隶主阶级的贪婪本性所

决定的。成吉思汗曾对他的儿子们说：“天下地面尽阔，教您各守封国。”^{①①}他们把掠夺它国领土和财富作为自己的职责，因而驱使蒙古人民踏进了战争的深渊。为了战争的需要，当时规定：“家有男子，15 以上、70 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①②}把十五、六岁的少年，六、七十岁的老人都送上前线，这是多么悲惨啊！因为蒙古兵源枯竭，从成吉思汗到旭烈兀西征的过程中，都有大批北方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的军士和工匠被征去从军。1235 年时，窝阔台曾有“遣回回人征江南，汉人征西域”的打算，只是因为耶律楚材的反对才作罢。^{①③}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并没有利用蒙古统一的有利条件来建设蒙古社会，反而发动战争，造成大量劳动力的丧失，社会生产力停滞不前。随军远征的蒙古人往往葬身异国，留在漠北的蒙古人则过着水平极其低下的生活，这就是西征给蒙古广大牧民带来的苦痛。

中国的其他各族人民以及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对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西征也是反对的。成吉思汗发动西征与南下灭金是同时进行的。富有抗蒙斗争传统的山东红袄军，曾多次抗击了南下的蒙古军队。1214 年，红袄军曾坚守潼关，1222 年，在彭义斌的领导下，奋起抗击进入山东、河北的蒙古军队，他们“既破东平，随据大名，声势甚张。南（指金）、北（指蒙古）军待为劲敌，无敢试之者”。^{①④}有力地牵制蒙古东线的军队，间接地支持了中亚各国人民的抗蒙斗争。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对成吉思汗西征也是反对的。丘处机在谒见成吉思汗的往返途中，目睹了战争对人民生命财产破坏的惨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夹道横尸人掩鼻，溺溪长耳我伤情。十年万里干戈动，早晚回军复太平。”^{①⑤}他多么希望尽早结束这场战争啊！随成吉思汗西征的耶律楚材借出现怪兽“角端”的机会，劝成吉思汗早日班师，并说“愿承天心，以全民命”。^{①⑥}可见，反对西征的人，当时大有人在。

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西征，是在人民群众无权的情况下进

行的。中国各族人民虽然反对西征，但他们不是当权者，不是决定政策的人们，因此无法制止西征的进行。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族和被侵略的亚欧各国人民一样，都是西征的受害者。

①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67 页。直译为“秃秃黑里兀惕一塔塔儿。”

②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③ 《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④ 《元朝秘史》第 254 节。

⑤赵珙：《蒙鞑备录》。

⑥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

⑦ 二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

⑧ 《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六。

⑨ 《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504 页。

⑩ 《元朝秘史》第 255 节。

⑪ 《元史》卷四六，《兵志》一。

⑫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⑬ 元好问：《千户乔公神道碑》，《遗山文集》卷二九。

⑭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⑮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原载《光明日报》1979 年 9 月 11 日）

浑都海、阿蓝答儿之乱的前因后果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在宁夏地方曾爆发了一次浑都海、阿蓝答儿之乱。这次叛乱是以反对忽必烈即汗位、拥护阿里不哥称大汗的形式出现的，但叛乱的原因则由来已久。叛乱平息之后，元廷加强了对宁夏地区的开发和管辖，“宁夏”之名也被正式采用，伊斯兰教在宁夏地区的大规模传播也自此始。

一 阿蓝答儿钩考： 蒙哥和忽必烈的一次较量

蒙古国在灭亡西夏和金国，占领整个中国北方后，主要采取掠夺方式来统治这些地区。当时官吏素质极差，统治制度和剥削制度尚未制订，“时天下新定，未有号令，所在长吏皆得自专生杀，少有忤意，则刀锯随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遗者”。^①“长吏兼领民军钱谷，往往恃其富强，肆为不法”。^②太宗窝阔台时，契丹人耶律楚材提出用《便宜十八事》作为临时法律，太宗基本上同意执行；耶律楚材又提出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管理税收，也得到批准。但在具体执行时，又遇到重重困难，耶律楚材那一套，对蒙古、色目贵族来说是很不习惯的，其建策“见于设施者，十不能二三”^③。到太宗晚年，用蒙古人失吉忽都忽任中州大断事官，称燕京行台，耶律楚材的政策大为走样，恣意科敛差

发的情况十分严重：“若汉地差发，每户每丁以银折丝绵之外，每使臣经从调遣军马、粮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率民户。诸亡国之人甚以为苦，怨愤彻天，然终无如之何也。鞑主不时自草地差官出汉地定差发。〔徐〕霆在燕京，见差胡丞相（失吉忽都忽）来，黠货更可畏，下至教学行及乞儿行，亦出银作差发。”^③又命回回商人牙刺瓦赤为中州断事官，剥削更加厉害。以后乃马贞氏称制，定宗贵由短暂执政，出现了“民力益困”^④的状况。

宪宗蒙哥即位时，社会凋弊的状况更加严峻。忽必烈的谋士刘秉忠目睹中原社会现状后写道：“天下户过百万，自忽都那演断事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⑤许衡甚至惊呼：百姓“殆将起乱”！^⑥蒙哥即位后，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革除弊政：“颁便益事宜于国中：凡朝廷及诸王滥发牌印、诏旨、宣命，尽收之；诸王驰驿，许乘三马，远行亦不过四；诸王不得擅招民户；诸官属不得以朝觐为名赋敛民财，民粮远输者，许于近仓输之。”^⑦在波斯史学家志费尼的著作里，也记载了蒙哥收还牌印、整治驿站等情况，有关赋税的问题讲得更详细：“为了不让每个总管〔随他自己的意见〕摊派〔赋税〕，他制定了一个一年的计划，……举凡有逋欠赋税之地和欠下它们的农夫，将不交纳〔这些逋欠〕，也不得向他们征收它们。至于曾经跟贵由汗、他的妻子及子女作大买卖的商人和斡脱，他命令从新的赋人中赏付他们。”^⑧蒙哥对牙老瓦赤等恣意杀戮的行为也曾加以制止。

宪宗 2 年（1252 年），蒙哥在编籍户口后，分封诸王。其弟忽必烈分封于京兆（今陕西西安），不久“以京兆田户寡，盖以怀孟（今河南沁阳），且诏总天下之兵。”^⑨就蒙哥当时的本意来说，将漠南汉地交给自己的亲弟来治理这是最放心不过的了

但忽必烈毕竟不是蒙哥。早在漠北“潜邸”时，他就十分注

意延揽汉族地主知识分子，海云禅师（宋印简）、刘秉忠、张文谦、张德辉、李治、王鹗、赵璧等先后成为他的幕僚。在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影响下，他刻意模仿唐太宗，“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文学四方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⑩主管漠南汉地后，杨惟中、姚枢、宋子贞、郝经、许衡、王文统等又为其所用。郝经所说“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⑪，对他的影响尤其深刻。忽必烈用“中国之道”——“汉法”来治理陕西、河南、邢州之地，成绩斐然。“置经略司于河南，宣慰司从宜所于关西，行部于秦州（今甘肃天水），漕运司于卫（今河南沁阳），安抚司于邢（今河北邢台）。尽遣诸军屯田戍边，首淮尾蜀，以休秋冬士马往来之劳，东西数千里，道不拾遗。中侯屯廩，翕然归心。”^⑫忽必烈用史天泽为河南经略使，天泽“以河外虚耗日久，封豕存食于内，边寇日侵于外，非大与休濯则大可去之。举贤能、汰冗滥、抑豪强、均赋役，信赏明罚，训农劝兵，列堡戍以绝寇冲，实屯廩以给边饷，凡政之不便及民欲而未得者，率更张而立行之”。^⑬杨惟中、商挺在关中，也是政绩卓著：“兵大之余，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皆惊忧无聊。挺佑杨惟中，进贤良，黜贪暴，明尊卑，出淹滞，定规程，主簿责，印楮币，颁俸禄，务农薄税，通其有无。期日，民乃安。”^⑭宪宗四年（1254年）廉希宪接任京兆宣抚使，用许衡提举京兆学校，教育人才；释放士之俘为奴者，悉令著籍为儒；压抑豪强，平反冤狱。^⑮

忽必烈在陕西、河南等地推行的这些措施，在蒙哥看来走得太远了。蒙哥做大汗，当然希望社会安定，财富充足，但他并不主张用“中国之道”治天下。现在忽必烈重用汉儒，采用“汉法”，把他的分地治得井井有条，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甚至军队的布匹、米、帛、械器等也多有所依赖^⑯。当时忽必烈“总天下兵马”，手中握有重兵，再加上关陕、中原的财赋、粮

食，其势可谓咄咄逼人。最可怕的是“王府（忽必烈）得中土心”^{①⑦}，对蒙哥的威胁太大了。这时，以阿蓝答儿为首的一些蒙古贵族，“憚世祖英武，谗于宪宗”^{①⑧}，于是他们兄弟之间发生隙嫌。蒙哥汗为了防患于未然，采取了两大步骤：第一步，削去忽必烈兵权^{①⑨}，第二步，派阿蓝答儿等钩考陕西、河南等地钱谷。

阿蓝答儿是蒙哥的亲信，位居大必阁赤^④，汉人称之为左丞相^{②④}。宪宗 7 年（1257 年），蒙哥命阿蓝答儿为陕西行省左丞相、刘太平为参知政事，率囊家台、脱因等到陕西、河南钩考钱谷。阿蓝答儿“至京兆，大集汴、蜀兵民之官，下及管库、征商之吏，皆入计局，为条百四十二，文臻致多方，且晓众曰：‘惟刘万户（刘黑马）、史万户（史天泽）两人罪请于朝，’……自余我到专杀，虐焰熏天，多迫人于死’。^{②⑤}他们“检核所部，用酷吏分领其事，大开告讦”^{②⑥}。仅京兆一地，“锻炼群狱，死者 20 余人，众皆股栗”。^{②⑦}在河南，阿蓝答儿也用考问的办法来罗织罪名，然后勒索钱谷，其贫不能输者，后由忽必烈代为赔偿^{②⑧}。阿蓝答儿奔赴陕西、河南进行钩考钱谷，采取的手段是严刑拷打，大搞逼供信，以锻炼成狱，其目的是证明忽必烈的藩府人员在掌管陕西、河南财赋时“多擅权为奸利事”^{②⑨}，从而夺其所谓“非法所得”，归朝廷所有。这样既可打击忽必烈，又使朝廷增加财政收入。

在蒙哥的步步进逼下，忽必烈无可奈何，只得退让，接受谋士姚枢的建议，用王妃为人质，亲去河西晋见蒙哥。蒙哥也闻之不信，恐其有诈。忽必烈再遣使说明，“诏许驰二百乘传，弃輜重，先及见，天颜始霁。大会之次，上（忽必烈）立酒尊前，帝（蒙哥）酌之，拜退复坐；及至，又酌之；三至，帝泫然，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敕罢关西钩考，废行部、安抚、经略、宣抚、都漕诸司。”^{②⑩}

这场斗争，终因忽必烈的妥协退让而暂时结束。但双方矛盾

斗争的根本原因依然存在。而且，通过阿蓝答儿钩考事件，矛盾双方的阵容也明朗化了：受到打击的忽必烈王府人员（实际上是忽必烈封地内的各级官吏）更坚定地站在忽必烈一边，他们寻找机会，拥戴忽必烈夺取汗位，以推行“汉法”；蒙哥手下的大臣们则处处防范忽必烈，阻止他权力增长。所以，蒙哥去世后，阿蓝答儿、浑都海之乱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这一长期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 浑都海之乱： 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在西北的争夺

宪宗 9 年（1259 年）7 月，蒙哥汗在进攻南宋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山时，病死于阵。消息传来，忽必烈和他的幼弟阿里不哥都积极准备夺取汗位。

当时忽必烈率军围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得蒙哥死讯后，立即召集诸谋臣、诸将商议大计。郝经提出“断然班师，亟定大计”之策。主张：“先命劲兵把截江面，与宋议和，许割淮南、汉上、梓、夔两路，定疆界、岁币。置輜重，以轻骑归，渡淮乘驿，直造燕都，则从天而下，彼（指阿里不哥）之奸谋僭志，冰释瓦解。遣一军迎蒙哥罕灵輿，收皇帝玺，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诸王驸马，会丧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凉、东平、西京、北京，抚慰安辑。召真金太子镇燕都，示以形势。则大宝有归，而社稷安矣。”^④忽必烈采纳了郝经的建议，与宋相贾似道议和，缔结密约，迅速北归。次年 3 月，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召开忽里台（大聚会），在西道诸王合丹、阿只吉等，东道诸王塔察儿、也先哥、忽刺忽儿、爪都等拥戴下即大汗位，并改是年为中统元年。

4 月，阿里不哥在和林（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哈拉和林）也

宣布称大汗。阿里不哥是蒙哥和忽必烈的幼弟，蒙哥即位后，他留守和林，拥有强大的兵力。值得注意的是，蒙哥的旧臣几乎都站在阿里不哥一边，特别在关陇、河西地区，他们占有一定的优势。当时阿里不哥采取的措施是：命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事于燕都（今北京），按图籍，号令诸道；令阿蓝答儿、浑都海纠集军队，据兵六盘、甘肃；令刘太平、霍鲁海储备粮饷，图谋秦蜀，形成有力局势。阿里不哥还得到窝阔台后王阿速带、玉龙答失、昔里吉，察合台后王阿鲁忽，旭烈兀子出木哈儿等的支持。

面对阿里不哥咄咄逼人的形势，忽必烈立十路宣抚司以控制华北形势：以赛典赤赡思丁、李德辉为燕京路宣抚使，宋子贞为益都济南等路宣抚使，史天泽为河南宣抚使，杨果为北京等路宣抚使，张德辉为平阳太原路宣抚使，李鲁海牙、刘肃为真定路宣抚使，姚枢为东平路宣抚使，张文谦为大名彰德等路宣抚使，粘合南合为西京路宣抚使，廉希宪为京兆等路宣抚使。^②当时斗争的焦点集中在陕西、河西地区，廉希宪赴京兆（今西安）任宣抚使，他肩负重任，关系极大。

当时陕甘地区的形势是这样的：阿蓝答儿为陕西行省左丞相、刘太平为参知政事，实际上控制了陕西；哈刺不花、浑都海都是蒙哥征蜀的旧将，驻兵六盘山，四川成都有密里火者，东川（今四川三台）有乞台不花，都是蒙哥麾下的骁将，实际上秦蜀、关陇之地不在忽必烈之手。

叛军之中，浑都海实力最强，也是叛乱的主谋和主力。京兆宣抚使廉希宪的副手商挺分析浑都海的动向是这样的：“为六盘，有三策：悉锐而东，直捣京兆，上策也；聚兵六盘，观衅而动，中策也；重装北归，以应和林，下策也。”而且商挺断定他们“必出下策”。^③果然，中统元年（1260年）6月，当廉希宪等进驻京兆，宣布诏旨，遣使安谕六盘时，浑都海杀廉希宪所遣使者

朵罗台，约京兆刘太平、霍鲁海，成都密里火者，东川乞台不花等“同日俱发”。^⑨廉希宪早有准备，遣万户刘黑马、京兆治中高鹏霄、华州尹史广，抢先捕获刘太平、霍鲁海及其党羽。浑都海未能乘人不备，直捣京兆，联合刘、霍，是其一大失策。接着，廉希宪急命刘黑马率军南下，诛密里火者；四川总帅汪惟正杀乞台不花，使浑都海陷于孤立。

浑都海眼看形势不妙，大肆劫掠府库，骚扰北上，西夏地区遭受严重破坏，“自浑都海之乱，民间相恐动，窜匿山谷”，社会极不安定。

廉希宪当机立断，未经请示，调兵遣将，堵截浑都海。命汪良臣率秦、巩诸军进六盘，良臣以未得上旨为辞，廉希宪解自佩虎符银印授之，并拨出军费，促其出兵；又组织更戍蜀卒及在家余丁，命蒙古官八春为将，并告之曰：“君所将之众，未经训练，六盘兵精，勿与争锋，但张声势，使不得东，则大事济矣”。所谓“使不得东”，只是因为关中无兵备，万一浑都海来攻，希宪无法与之抗拒。八春的乌合之众，竟然也产生了“草木皆兵”的效果，浑都海竟然徐徐北上了。廉希宪说：“浑都海不能乘势东来，保无他虑。今众志未一，犹怀反侧，彼军见其将校执囚，或别生心，为害不细。今因其惧死，并加宽释，使之感恩效力，就发此军余丁，往隶八春，上策也。”当时，在京兆的廉希宪并无多少兵力，捕杀刘太平、霍鲁海后，其原有将校、诸奥鲁官，心存疑虑，时时存兵变的可能，廉希宪采取宽容政策，他们“大喜过望”；“人人感悦”，八春“果得精骑数千”，反可用来对付浑都海叛军。

9月，阿蓝答儿率军自和林南下，与浑都海、哈刺不花会师于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哈刺不花与阿蓝答儿等意见不合，自引其兵北去。浑都海、阿蓝答儿合军而东，来势凶猛，“诸将失利，河右大震”，“朝议欲弃两川，退守兴元，希宪力言不可，乃

止’。^②此时，诸王合丹、合必赤、阿曷马等及老将按丝迹等率骑兵来，与汪良臣、八春合兵，分三道迎战浑都海、阿蓝答儿于西凉，良臣以短兵突其左，绕出阵后，溃其右而出；八春直捣其前；合丹等勒精骑断其归路，大败叛军，俘斩略尽，俘浑都海、阿蓝答儿，械至京兆被杀。历时 3 月的浑都海、阿蓝答儿叛乱结束。哈刺不花纠集残兵往西退走。

浑都海之乱是阿里不哥叛乱的第一次大会战，从此，阿里不哥势力已无力伸向漠南，忽必烈方面则由于廉希宪用兵得当，在自己势力最薄弱的西北地区获得了意外的胜利。从此，西北陕、甘、宁之地在元朝管辖下，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了有效的开发。

三 叛乱平定：元朝开始经营宁夏

西夏亡后，太宗窝阔台将西夏故地分封给他的次子阔端，阔端建王府于凉州（今甘肃武威），以此为基地，开展对西蕃用兵和争取归顺工作。阔端卒后，其后裔封地西移。今宁夏地区，当时仍称西夏，或称中兴等路。宪宗时分封给一位曾侍奉过拖雷正妻、蒙哥和忽必烈的生母唆鲁和帖尼（庄圣太后）的“近属贵人”只必铁木儿，他“镇西方，其下纵横，需索旁午，不可会计”。^③事实上，从蒙古灭西夏以来，30 余年间未曾恢复元气。一是“郡县废于兵”^④，西夏灭亡前，中兴等地遭受地震、兵乱和屠城，大部分城镇成为废墟；二是“土瘠野圯，十未垦一”^⑤，由于居民逃徙，大批田野荒芜；三是原有水利设施，“兵乱以来，废坏淤浅”^⑥。特别是浑都海之乱发生后，所在郡县的府库被洗劫一空，本来就稀少的居民，为了避兵，纷纷逃匿山谷。

平定浑都海之乱后，世祖忽必烈开始控制了西夏地区，因而为西夏地区的全面治理开创了新局面。世祖治理西夏地区共分为行省治理和安西王治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至元元年至 9 年（1264—1272 年）行省治理阶段。以张文谦、郭守敬、董文用政绩最为显著。其主要措施有四：

其一，建立各级政府机构。中统 2 年始立西夏中兴等路行中书省。至元元年，世祖命中书左丞张文谦行省西夏中兴等路。当时的情况是“羌俗素鄙野，事无统纪”，可见，经三、四十年战乱后，西夏地方的文化发展和管理水平大大倒退了，昔日西夏王朝井井有条的管理已荡然无存。文谦乃“求蜀士为人仆隶者得五六人，援恩例，理而出之，俾通明吏，教以案牍，旬月之间，枢机品式，粗若可观”。^⑦一切都是从头开始，衙门里的一套规章制度逐渐建立起来。但阻力很大，那个封于此地的贵人只必铁木儿及其下属，横行不法，“需索旁午，不可会计，省臣不能支。公（行省郎中董文用）坐幕府，辄面折以国法。其徒积忿谮公，贵人怒，召使左右杂议之，意叵测。公曰：‘我天子命吏，请得与天子所遣傅贵人者辩。’……来诘问，公不承贵人旨意状。公曰：‘我汉人，生死不足计，我所恨者，仁慈宽裕发贵人，以重威镇远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伤贵人威名，于事体不便。’因俛指其不法者数十事。诘问者惊起去，白贵人，即召公谢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忽怠。’自是谮不行，而省府事粗立”。^⑧经过这番斗争，省府的职权得到确立，贵族的势力受到压制。

其二，兴修水利。西夏濒河五州，均有古渠。其在中兴州（今银川）者，一名唐来，长袤 400 里；一名汉延，长袤 250 里。其余四州，又有正渠 10 条，长袤各 200 里，支渠大小共 68，计溉田 9 万余顷。兵乱以来，废坏淤浅。张文谦命郭守敬、唆脱颜巡视河渠，守敬“因旧谋新，更立牐堰，设不逾时，而渠皆通利”^⑨，这些牐堰直到明代仍发挥作用，明修《宁夏新志》说：“逮今两坝桥梁，尚其遗制，工作甚精。”^⑩董文用也曾疏浚了唐